

杨讷史学著作四种

丘處機
“一言止殺”考

杨讷史学著作四种

丘處機
“一言止殺”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杨讷著.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8.2

(杨讷史学著作四种)

ISBN 978-7-5325-8695-0

I. ①丘… II. ①杨… III. ①丘处机(1148-1227) — 人物研究 IV. ①B95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4298 号

杨讷史学著作四种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

杨 讷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25 插页 6 字数 108,000

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

ISBN 978-7-5325-8695-0

K·2419 定价: 35.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杨讷，1935 年出生上海，祖籍江苏镇江。1953 年毕业于华东师大附中，同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五年制。1958 年进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攻元史。1986 年转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1995 年退休。



与妻子郑启吟在温哥华

前 言

这本小书由三篇文章组成，其中两篇讲丘处机“一言止杀”，一篇讲早期全真道与方技，都是以前在《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过的。

我最早写的一篇讲丘处机“一言止杀”的文章，刊登于2002年出版的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上，篇名即为《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那篇文章八千字，发表不久我就意识到以这点篇幅是解决不了这样的难题的，酝酿改写。2006年我读了齐鲁书社出版的专著《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其中讲丘处机的章节就达四万字，遂决意改写《辨伪》，这便产生了《再辨伪》。《再辨伪》三万多字，是原来《辨伪》的四倍，足以覆盖《辨伪》的全部内容。现在本书收了《再辨

丘处机“一言止杀”考

伪》，自然没有必要再收《辨伪》。这次以《丘处机“一言止杀”考》用作本书书名，不便之处，有请读者谅解。

作 者

2017年6月

目 录

前 言 / 1

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 / 1

早期全真道与方技的关系及其他 / 63

丘处机“一言止杀”三辨伪

——兼评赵卫东《丘处机“一言止杀”

辨正》 / 156

丘处机“一言止杀”再辨伪

前 言

在全真道历史上，长春真人丘处机（1148—1227）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至今人称丘祖。1222年丘处机应召在西域晋謁成吉思汗的事迹，是后世全真道徒津津乐道的话题，也深受近代学者重视。相传丘处机当面向成吉思汗建言止杀，成吉思汗采纳其言，在战争中停止或减少了屠杀。从元至今，全真道徒一直宣扬丘处机这一功绩，清朝的乾隆皇帝还将它概括为“一言止杀”（见乾隆题北京白云观丘祖殿：“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现今有些学者仍不同程度地认为实有其事。我怀疑这段故事的真实性已有多年，曾于2000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丘处机“一言止杀”辨伪》，发表在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上。^① 我从最早的关于丘

^① 《揖芬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页523—532。

处机西行的记载入手，循迹而下，通过史料的排比与分析，揭示这段故事是怎样生成的。我的结论是，所谓“一言止杀”不过是丘处机的后继者们炮制的谎言。文章发表后，本以为自己的抛砖之举或许能引起一点讨论，结果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那本文集印数甚少，知者寥寥。惟一使我尚感鼓舞的，是牟钟鉴教授在2003年香港举行的一次全真道学术讨论会上提到了我的文章。牟教授是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但他中肯地指出，如果我的说法成立，“则一系列全真史料的真实性都要受到怀疑，丘祖的历史评价也要重新改写了。这个问题必须由全真道研究者加以回答，而且必须由史料的考辨入手”。^①的确，我对全真史料（准确地说，是全真道徒撰写的史料）的真实性的怀疑并非只有我在上篇文章中指出的若干处，我对丘处机的评价也远低于现今有些研究者所作的评价。因此，我在读了牟教授的文章以后，非常盼望读到反驳我的观点的文章，以便深入进行讨论。

半年前我认真拜读了2005年齐鲁书社出版的由牟教授主持编写的《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下简称《全真七子》）。这

^① 《全真道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全真道传承与开创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香港，2003年，页45。

部书总共四十万字，其中专讲丘处机的章节逾四万字，全面肯定了丘处机西行及其“止杀”的功绩，评价之高远远超出我的预料。惜乎此书并不由史料的考辨入手，甚至任意剪拼史料，以致其证据与结论多有商讨的余地。反过来再看自己几年前发表的那篇文章，明显存在言之过简和征引史料不足的缺点，还有几处笔误。而且，经过近几年的阅读和思考，我对当初把握不定的几个问题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故而对原先发表的文章作了修改、订正和补充。原作一万字，经此修订，增至三万字，但文章主旨依旧，结构亦无大的变化。谨以“再辨”的名义发表于此，敬向研究全真道的朋友们讨教。

一 《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时间

研究丘处机西行事迹，可读的资料不少。首先要读的是丘处机随行弟子李志常（1193—1256）写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下简称《西游记》），它是记述西行事迹最完整的第一手资料。但在利用《西游记》之前，先须辨明它的成书时间，因为过去王国维和向达先生曾有误判。

误判是由王国维造成的，他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的序文中说：

此记作于长春没后，前有孙锡序，署戊子秋后二日，正当睿宗拖雷监国之岁，而卷末有庚寅七月大葬仙师事，盖书成后所加入。^①

向先生在校注本耶律楚材《西游录》的前言中引了王国维的判断，接着说：

《西游录》成书于一二二八年，刊行于一二二九年。长春真人弟子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前面有孙锡的序，末署戊子，即一二二八年，与《西游录》成书之年同。但《西游记》末一直记到庚寅即一二三〇年长春之葬。王国维以为《西游记》成于长春没后，卷末一段是书成后所加入。这是执泥于孙锡一序的记年。其实是书还没有写成，先请人作序而已。^②

向先生与王国维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他们都以为《西游记》纪事至“庚寅”年，都想解释有“庚寅”年纪事的书何以会有戊

① 见《王国维遗书》(13)，上海古籍书店影印，1983年。

② 《西游录》前言，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页3。

子年的序。而且，他们的解说也只有微小的差别，因为只要承认书中纪事至庚寅年，就可以说书的最终完成是在庚寅年或再后。然而，他们两位都错了，《西游记》纪事仅至戊子年，书中根本没有庚寅年的纪事。

由王国维亲手校注的两卷《西游记》，其纪事仅至戊子年七月。导致王国维误判为庚寅年七月的，是下面这段文字：

戊子春三月朔，清和（尹志平）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历戊、己、庚。俄有平阳、太原、坚、代、蔚、应等群道人二百余赍粮助力，肯构是堂，四旬告成。……期以七月九日大葬仙师。六月间霖雨不止，皆虑有妨葬事。既七月初吉，遽报晴霁，人心翕然和悦……（以下具述葬事）^①

其中所说“历戊、己、庚”，是指戊子年四月第一个丁日以后的戊、己、庚三日。大概是一时疏忽，王国维竟以为“戊、己、庚”是指戊子、己丑、庚寅三年了，以致把丘处机的葬礼

^① 《长春真人西游记》（下简称《西游记》）卷下，载《道藏》（34），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1988年，页499上—中。

错认在庚寅年七月，这便要为孙锡作序的时间找一个说法。向先生没有查核原书，跟着错了。当时纪丘处机葬事的，还有一篇陈时可写的《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下或简称《会葬记》），其中明确写到尹志平等“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云中、河东道侣数百辈裹赢粮来助，凡四旬成”。^①可知《西游记》中的“上丁”日为丁未日，“庚”为庚戌日而非王国维说的“庚寅”年。丘处机在戊子年七月九日下葬，《西游记》纪事至“翌日”即七月十日。这年六月二十八日立秋，故知孙锡作序在六月三十日，早葬礼九天而已。想是当时赶着为丘处机葬事献礼，边筹办葬事，边请孙锡为《西游记》作序。序文拿到，葬事即举，李志常随后在书尾再添几笔，最终完成了《西游记》全书。

二 《西游记》为何不见长春止杀之语

现在可以确认，《西游记》是1228年问世的，它是记述丘处机西行事迹最早最完整的第一手资料。可是，《西游记》中偏偏没有后世广为流传的“一言止杀”故事。这个问题，晚清

^① 《甘水仙源录》卷九，载《道藏》（19），页796下。另见陈垣编纂，陈智超、曾庆瑛校补《道家金石略》，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页458。

的全真道徒陈铭珪（1824—1881）注意到了。陈铭珪字友珊，广东东莞人，咸丰壬子（1852）副贡生，晚学道，为罗浮酥醪观住持，自号酥醪洞主。他在光绪年间著《长春道教源流》八卷，竭力推崇丘处机“一言止杀”的历史功绩，甚至把成吉思汗1224年由西域东返也归因于丘处机进言止杀，说是“当时太祖班师，实因长春劝以止杀使然”。^①陈铭珪以一个虔诚的道徒作如是说，是不奇怪的；但他并不讳言《西游记》未载丘处机“止杀”之语。他解释说：

或曰：长春止杀之语，此《记》未之载，何耶？曰：此志常之慎也。当长春入对时，与坐者止阿海、阿里鲜、刘仲禄、田镇海四人，而仲禄、镇海必长春请召之乃得入帐。长春守老子成功弗居之训，不言温树，志常未之闻，故不敢载也。然《记》载长春“十年兵火万民愁”一诗，又载“欲罢干戈致太平”一诗，又载长春“奏话期将至，可召太师阿海”，阿海固曾以“止杀掠，应天心”告太祖者。长春之望太祖止杀，《记》固曲传之矣，况元时诸家

^① 《长春道教源流》卷二，聚德堂丛书本，叶34B。另见《续修四库全书》，1295册（下简称“续修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364上。

文集具述之，《元史》亦特纪之乎！^①

陈铭珪的解释完全出于臆测，不能消除别人的疑问。首先，他忽略了《西游记》是一部集体的游历记录，并非李志常个人著述；李志常只是执笔人而已。当时随丘处机西行的十八（一说十九）弟子，陪同丘处机抵达成吉思汗行在的不过五六人，多数留在了途中。李志常是最早留在途中的一个。据《西游记》卷上，辛巳年（1221）七月二十五日，丘处机等一行抵阿不罕山。次日镇海来见，对丘处机说：“前有大山高峻，广泽沮陷，非车行地。宜减车从，轻骑以进。”处机“用其言，留弟子宋道安辈九人，选地为观”。李志常便是留在阿不罕山的九人之一。王鹗《玄门掌教大宗师真常真人道行碑铭》记：

〔辛巳〕秋七月至阿不罕山，距汉地几万里，并山汉人千家，逆师（丘处机）罗拜，以为希世之遇，咸请立观，择人主之。师将行，指公（李志常）坐上语众曰：“此子通明中正，学问该洽，今为汝等留此，其善待之。”因赐公

^① 《长春道教源流》卷二，叶34B—35A；另见续修本，页364上一下。

真常子号，额名其观曰栖霞。^①

李志常、宋道安等就此留在阿不罕山，直到癸未（1223）年五月丘处机东返途经阿不罕山时才与其师会合，时间已过去一年零十个月。《西游记》总共约二万三千字，其中近万字是记丘处机在这一年零十个月里的游历与活动。这一万字的纪事，李志常完全是根据丘处机本人和当时在丘处机身边的几个弟子提供的笔记或口述撰写的。其书完稿前后，必定经掌教尹志平等西行弟子看过。因此，我们必须如实地把《西游记》看作集体的制作。《西游记》未载“一言止杀”故事，原因不在李志常个人慎不慎、闻未闻、敢不敢，而在这个集体无人知晓这个故事。

那么，为什么会无人知晓呢？能不能像陈铭珪那样，把原因归于丘处机“不言温树”（语出《汉书·孔光传》，意谓不言宫禁中事）呢？不能。《西游记》分明讲了1222年四月至1223年三月丘处机多次晋见成吉思汗的情景与对话，讲了丘处机劝成吉思汗在蒙古人中提倡孝道，讲了成吉思汗出猎坠马，丘处

① 《甘水仙源录》卷三，载《道藏》（19），页745中；另见《道家金石略》，页578。